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文 | 任曙林
摄

昨天的青春
八十年代中学生



昨天的青春
八十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 文 / 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天的青春：八十年代中学生 / 任曙林文摄.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9

ISBN 978-7-5502-8542-2

I. ①昨… II. ①任… III. ①中学生—学生生活—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G635.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9387 号

本书所有权利归属于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昨天的青春：八十年代中学生

著 者：任曙林

选题策划：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吴兴元

策划编辑：马国维

编辑统筹：蒋天飞

特约编辑：尚 达

责任编辑：李 伟

营销推广：ONEBOOK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李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9 千字 720 毫米 × 1030 毫米 1/16 18 印张 插页 4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542-2

定价：99.8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前言 / 照片里的青春

大凡在青春时代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会有一个“八十年代情结”，我当然也不例外。

八十年代的青春是无法复制的青春，是一段刚开始就终止但并没有结束的青春。

很庆幸自己在八十年代度过了完整的中学时代和三年的大学时光。也正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的时候，我就被这些影像深深地吸引。是的，照片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熟悉。

回忆自己八十年代的中学时光，立刻会有很多镜头闪回。

高考前的一个夜晚（1987年），我们文科班的几乎所有男生（其实只有12人，那时候文科班严重阴盛阳衰，男生只占1/4人口）骑着单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围坐在一起，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胡乱地互相揭发谁喜欢哪个女生。最后，一帮少年又来到天安门城楼黑漆漆的门洞里，坐成一排，每人都叼起一根烟，点着，深吸一口，烟头闪亮……仿佛要在高考前做尽所有的“坏事”。

那时候的我们喜欢诗歌，喜欢戏剧，喜欢电影，我们敢旷课跑到“八一厂”，就为了看伯格曼的《处女泉》和《第七封印》。那个时候，石康（我的师大附中初中同学）已经是标准的文学青年，开始狂写约翰·克里斯托夫式的长篇小说；王胖子（王阳，后来叫“老狼”）正在北京八中的校园里弹着吉他泡他的小师妹……

那个时候，任曙林照片中的北京一七一中学学生王琳和一个男生正在秘密地早恋。一天傍晚，在空旷的教室里，他们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但门外的脚步声让他们瞬间分开，回到各自的座位。走进来的是摄影师任曙林，彼时的任曙林并不知道教室里的这一对男生女生是恋人，他只感到教室里安静得仿佛能听到“夕阳移动的声音”，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第三者”，于是拍了一张照片后，任曙林便悄悄地离开了。多年以后，王琳在映画廊看到这张照片，激动得痛哭：她和照片中的那个少年恋爱、一起留学，然后结婚，最终分开……她对任曙林说，本来她以为青春已经不见了，但现在她发现原来青春还活在这些照片里。

虽然认识任曙林这么多年，还做了他的策展人和图片编辑，但我其实一直无法真正知道五十年代出生的他为什么会用十年时间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他一直说那也是一个秘密，妙峰山山顶的秘密……

我的大学同学张立宪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书《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是的，永远的八十年代，一段青春的密码还未解开，一首青春的歌还未唱完……

那日松 | 《八十年代中学生》策展人，映艺术中心 / 映画廊艺术总监。1981 至 1987 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1987 至 1991 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玉渊潭与爬山

小时候，家附近有个玉渊潭公园。它没有围墙，却有村庄猪圈、麦田和桑葚树，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是那种沿着土路踩着野草可以一直走到水边的小河。“文化大革命”前父亲经常带我和妹妹去那里。也许父亲不喜欢北海、颐和园，我第一次去那些地方，已经是上初中了。

玉渊潭叫公园，但除了门口竹子牌楼上的几个字，并没有什么公园的软硬件设施。在我的心目中那就是一片田野，父亲说这里是真山真水。玉渊潭深处有个石头台子，上面刻着“元人王某钓鱼台”。台子前边是竹篱笆墙，里面就是国宾馆。父亲有个上海 202 照相机，一摞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他不让我动，每次在玉渊潭拍照片，都是他掌机，我顶多是个助理。一次父亲让我和妹妹站在麦田里照相，我说都没太阳了，他说麦子金黄有反光。他发现有个猪圈盖得好，为了把它拍全，结果妹妹在照片里只有半个身子。玉渊潭有一大片湖水，湖水西边有一大片芦苇，里面有野鸟什么的。每次去玉渊潭，父亲都要带我们在这里看落日，望着彩霞和飞鸟。他告诉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话我不太懂，却对那满目的景色印象深刻。父亲在那个时刻总喜欢双手盘在胸前，眯着小眼睛望着远方，我不清楚他在想什么。慢慢地我也喜欢向遥远的西天眺望，那神秘的彩霞和飞鸟似乎有无限的意味，让我琢磨了很长很长时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再没有带我们去玉渊潭，那台上海 202 相机不知何时我可以摆弄了。中学那几年，我们几乎没上什么课，夏天学农，平时学工又学军。1969 年中

苏边界紧张，我们成天在校园里挖防空壕，说是要防苏联的空袭。这下学生可有事干了，特别是男生，我们从夏挖到秋，从秋挖到冬，从不会使铁锹手心打泡，到站在两米深的沟里，两手一使劲儿，一锹土就飞上了沟。一场冬雪后，我们的防空壕像一条地龙，蔚为壮观。1970年年初，不少同学要随家长奔赴“五七”干校。同学分离，我的上海202大显身手。男生们全站在防空壕里，仰头向上，沟边的土堆像座座群山；几个人爬到颐和园的树上，各摆身段，模仿武林高手；在天安门广场，哥儿几个手持《毛主席语录》，我们摆个半蹲的姿势。一次在景山最高的亭子上，我提议拍一张大家说话的自然像，不要叫人看出是为了照相，而是在讲话中拍的，结果大家自言自语，东张西望，拍下怪怪的一幕。

玉渊潭的自然景色培养了我对野外的兴致，在我眼里北京的景山、香山不算山，只有那种真山真水的野山才过瘾。上初中那会儿我常去爬山，越爬越远越荒凉，母亲总担心有狼，我说没有。上小学那阵子，国家号召青少年开展四项体育活动：跑步、旗语、游泳和登山。你看国家都号召爬山，可见我的想法是多么正确！把裤子扯破了……那算什么，解放军还练习匍匐前进呢！我终于从理论上战胜了妈妈。

我一十六岁到工厂当钳工，那是个技术活儿，可我没有忘记爬山，只是不能每星期去一趟了。这时期我的登山水平提高了，胆子也越来越大。我敢在山里住几天，并能在深夜摸上山去。我愿意雨天爬山，更喜欢下雪进山。有一年年底，大雪刚停，我和一个朋友带着二十几个大火烧和一瓶白酒就进山了。记得棉手套是在路上买的，夜里我俩蜷缩在一个石佛龕里，互相抱着双脚，冻醒了就喝一口白酒。那一宿真冷呀！

深山的雪夜，寰宇白茫茫的一片，满天的大雪静静地落入群山的怀抱。这是怎样撩人心魄的景色。东方泛白，红日初升，周围的一切清晰起来，满目银装素裹，静极了，美极了。

我从小身体单薄，光长了一个大个子。母亲没少给我吃好的，可我还是那么瘦。每次爬山回来我总是特别能吃，我的肺活量、大腿上的肌肉，以及负重能力都在增长。只要一到山顶，什么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你看那山，多么壮阔和悠久，多么安详和丰富，多么富有生机和永久的诱惑力。

北京的山挺多，有点儿名的我大多爬过。我喜欢观察每一块石头，每一棵小草，每一片流云。有一回大年三十我去爬山，遇到一个打柴人，他说我真有瘾，这会儿还不待在家里。1978年考学失败后，我一个人进了山，在藏身的破庙中思考今后该怎么办。奇怪得很，痛苦在山风中飘去，松涛使我振作，初升的太阳终使我看清方向，我吃光了带去的食品，轻装下山了。

1975年5月，我在京西的妙峰山山顶拍过这样一张照片：大全景，略俯视，远处群山莽莽，近景古塔残立，清晨七点阳光透亮，一群北京第五中学的学农学生，在古塔周围指指点点，眺望交谈。人物在画面中很小，也就看个形体吧。这一幕景象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以至于几年后心绪还时不时在上面徘徊，有一种很神秘的东西总在拨弄着我，是那群山？是那古塔？——还是那群年轻的中学生。

“星期五”沙龙和四月影会

“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自己钻研摄影，胡乱拍，当工人后搜寻到几本书，努力往规矩了拍。1977年给厂里的先进个人拍照片，我把从照相馆师傅那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我想拍的是要像这个人，不是模样像，而是一看，骨子里就是这个人。只是除了不用看镜头、出其不意地抓取外，就没有其他招了。也许我熟悉他们，也许我想法不多，直接的摄取倒也保存下许多信息，那背景，那服装，那头发和姿势，还有那没有化妆的脸。多少年后，这批影像显得有些价值，我感谢八年多的卢沟桥生活。

1978年我有机缘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那是一段恶补时期，每星期五晚上我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

我们的老师狄源沧先生懂外语，他有许多原版画册，最宝贵的是他从不照本宣科，总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纵横驰骋。我们每每把自己的照片交给老师评论后，他会记住，说不定哪天讲到哪位大师时，冷不丁把你那幅照片列举出来，这是令我们惊喜的时刻。这个沙龙什么人都请，画画儿的、写诗的、搞雕塑的、拍电影的，甚至还有放大专家、造照相机的。经常来沙龙的有二三十位，干什么的都有，摄影题材、手法五花八门。在1978到1979年年间，我们在池小宁家搞过两次摄影展，那时叫“观摩”。三间平房，大屋环室两圈小线，大小不一的手工放大黑白照片，用曲别针固定在小线上，相互切磋非常过瘾。

1979年元月，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那是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江湖高手，

从开始的相互打量，到相互认可，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有一段时间北京东四三条 35 号成了我常去的场所。王志平的家与池小宁家风格不同，余则相同，都是进屋没地方坐，没水喝，人满为患。彼此热情交流，诚心相待，这氛围这感觉现今已经很难寻觅了。

大家在 1979 年 4 月举办了第一回展览，真是五彩缤纷思路开放。我对第一回展览做了详细的笔录，七次往返卢沟桥工厂与北京中山公园兰室，逐幅编号采写，或褒或贬，随心而去。四十五位作者的一百七十余幅作品，连同它们的标题与配诗，最终汇集成一万五千字的备忘录。记得我把女友也叫到现场，让她把观众留言全抄下来。那次看展的人特别多，又喜欢留言，几天就可以写满一本。四月影会第二回展览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那一个月的画舫斋也是天天人满为患。那次展览有印刷目录留世，我不用站在现场受累了。

喇叭沟门

向狄源沧先生学习是要交作业的。1979 年元旦我和池小宁去了北京最北边的喇叭沟门，当然，我和小宁都喜欢爬野山也是一个原因。那时北京有个著名的知青典型叫何营，自学成才当了山区的赤脚医生，我通过女友的母亲认识了她。有了这个线索，我们俩出发了。

长途车在太阳快落山时才开到山口的汽车总站，我们顺着一条冰冻的河继续步行。天光映衬出河床冰面上的枯草，黑黑白白的，小宁像发现宝藏一样扑了过去。我也觉得挺有

意思，掏出相机拍了起来。十几分钟过去了，再看小宁已经趴在了冰面上，挎包翻开，地上铺着一块塑料布，买的做的各种配件和镜头摆放在上面。他围着这片草，摸爬滚打，测光调试，脚架石头全用上了。我坐在河边，看着越来越暗的身影，整整有一个多小时。

喇叭沟门的最高峰叫鸡冠砬子，老乡劝我们别去了，这倒更激发了我们的欲望。我穿上雨鞋，腰上缠了几圈绳子，小宁把器材轻了装。冬日阳光远淡，林密寂静，我们的登山能力得到山间打柴人的赞许，这时肯定又是一次拍摄高潮。给老乡拍照，要面对各种善良的问询，我们自然有许多善良的编造，这不是欺骗，这样最好。

山顶无柴，只有我们两人，拍照与观看都令人兴奋。一堆碎石支起我的上海 202，我为绝顶处的合影在调试准备，小宁偷拍下我的背影，撅着的屁股上有一块规范的补丁。新裤子买来先要把补丁打上，不仅是屁股上，还有膝盖上的两大块，我们俩的裤子全是这样。悬崖边有一块竖立的大石与山体裂开了不小的缝，脚蹬在上面似有晃动，我大喜，要把它踹下山去，小宁说危险，我说有绳子，没事儿。山谷的轰鸣回响了好一阵子，我们在山顶也有些心惊。回到村里后，不少老乡问我们：“在山上听到动静了吗？”我说：“惊天动地的，这里经常会这样吗？”老乡很为我们安全回来庆幸，告诉我们：“老辈人说了，几十年都没听说过这么大的动静，大概是鸡冠砬子成事了。”我们暗地里有些发笑，同时感到不少歉意。

那时吃住在老乡家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会帮他们干些活儿，会把拍摄的照片寄给他们，说话是算数的。这次我们住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里，主人家的小女孩叫小英子，刚

上小学。女主人会剪窗花，我们很是惊喜。小英子不认生，前前后后地跑，妈妈剪好后，她要自己贴到玻璃上，我们自然是一通拍摄。后来，我们把小英子带到麦场上，带到山坡上，山村的孩子面对镜头毫无紧张之感，在任何场地总能自然地展现她的天性，小宁过着导演瘾，我们则共同过着摄影瘾。清淡的冬日，留下挺煽情的光影。1990年国庆节，我再一次来到小英子家，她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笑着说：“这是我吗？”

今天算来距离我们爬鸡冠砬子山已经三十一年多了，那里的山民都还好吧，何营还在做医生吗？小宁已然西去，我还有勇气重返那个小山村吗？

为“星星”拍电影

1979年5月，我离开待了八年多的工厂，来到煤炭科学院电影室工作。单位配给我一台“红旗”牌16毫米电影摄影机，一块“海鸥”牌测光表。这种摄影机是手工发条驱动，上一次弦可以拍三十多秒钟，我们使用的是国产“代代红”，这种电影胶片一盒三十米，在“红旗”上拍完一盒，要上十来次发条。这种摄影机是手持操作，很灵活，适合拍新闻。到9月，我刚粗粗熟悉了它，还没有正式拍什么东西，却用它干了一次“私活”。

1979年9月，几位朋友准备搞画展。因为同年4月我们的摄影展览很成功，画画儿的朋友们劲头十足，信心更大。池小宁同核心的几位都很熟，早早得到了消息，并悄悄告诉我，要我做些准备。

干什么呢？拍一部小电影。

9月27日那天我们上阵了。掌机当然是小宁，我背着书包做助理。不停地拍需要不断地换胶片，要手脚麻利，还要时刻观察情况。当时的气氛挺紧张，中国美术馆东墙外看画儿的人多，便衣也不少，到28号那天，情况就严重了。一大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街头小混混似的青年人，起哄叫嚷，还对挂在铁栅栏和树上的作品动手动脚，气势像来砸场子的。九点多钟，又来了几位中年妇女，带着红袖箍，说是当地办事处的，又说是公园管理处的，态度强悍，嗓门极高。小宁直面拍摄，一位大嫂上来就抓摄影机，我和画画儿的朋友冲上去保护，小宁乘机转移阵地，一时间展场混乱无比。在喧嚣、争论和轻量级的接触中，作品保住了，可是有许多真正的观众离开了展览场地。我忽然明白，这才是这些来客的真正目的。美术馆东墙外树多，给拍摄提供支持和掩护，同时也给现场装卸胶片带来了方便。我们就像战地记者，在争执与混乱中，记录下这历史的时刻。不知何时现场静了许多，我突然发现四周站满了穿白制服的警察。撤，来不及，机器也来不及收，我和小宁被四五个警察带到了美术馆里面。

我当时很紧张，机器要是被扣，单位还不开除我？对方讲：“并没有说你们拍照有什么错，但要按规定检查。”结果把我书包里所有的胶片，拍过的、没拍过的全部拿走。记得当时还用随身的暗袋把机器里没拍完的那盒也取了出来，一起拿走了。

漫长的等待，双方彼此无话。寂静中，我曾试图向窗外望望，这才发现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我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看看小宁，他黝黑的脸上大眼睛向外努着，表情

严肃但不紧张，我瞬间也放松了许多。不知过了几小时，十几盒胶片如数送还。我惊奇地发现拍过的胶片已被冲洗出来，没有发现被剪去什么镜头。那几盒没拍过的后来发现少了几尺。

后来“星星”的朋友们要游行，使这次拍摄更加艰险，但我们记录了全过程，并把全部底片保存了下来。国庆节傍晚，小宁送来拍完的胶片，向我大致讲述了一下白天的情况，就匆匆离去了。夜幕中我送他下楼，望着他骑自行车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这小子真行。在我认识的求艺者中，池小宁是真正的勇士，这“勇”除了表现在探索上，也表现在义和德上。现今中国不乏前者，而后者少于前者。

当时胶片的冲洗是手工操作。我都是晚上九点以后，悄悄溜回单位干。“十一”过后，小宁又去圆明园等地拍过几次。11月“星星美展”在北海公园恢复展出，1980年夏天则转移到中国美术馆里面去了，后来的两次，由我掌机记录了“星星”的尾声。

初拍高考

1979年夏天的一天早上，单位有个同事突然告诉我：“今天高考，你不是喜欢照相吗，还不去？”我当时的反应是激灵一下子，抄起相机就溜出了单位。单位离家很近，有一所中学在家附近，有考场，我赶到那里时，各色考生正在进入校门。

我参加了1977年的全国首次高考，未中；1978年春，又参加了电影学院的招生考试，

复试了两次，还是未中。后来听说有人卖血，给文化部长写信，我没有这个勇气，拍电影和我擦肩而过。但两次高考给我留下新奇的印象，妙峰山山顶的幽灵在心中徘徊。

几把课椅放在大门口，两三个老师坐那儿，考生来了，起身，看看准考证，又坐下来闲聊。考生三三两两，陆陆续续，骑车的，走着的，有说有笑。校门口聚集着一些老人和中年妇女，几个小孩追跑打闹，有点像新学年开始的样子。我把自行车放好，走进校园，甚至在楼道里转了转，做考场的教室门上贴着封条，从教室后门的瞭望孔里，看到了摆放整齐的课桌椅。多少年后，我还奇怪，为什么管得这么松呢？

桌椅单行摆放，老师用脸盆打来水，把它擦在间隔的地上，降降温吧。楼道里排着一溜课桌课椅，考生在进教室前把带来的书包依次放在上面，小纸片上面写了号码，一张给考生，有绳的一张拴在书包上。开考后，我发现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有几个白瓷杯子，没把儿，杯口上方有一圈蓝道，谁渴了，举手，老师会送水过去。教室我是进不去的，在门口，我尽可能地拍下所能看到的一切，我想起自己年前赶考的心情。

中午考生们多数不回家，学校的小卖部有汽水和面包。那天我没回单位吃饭，一瓶北冰洋汽水里插着一根蜡管，面包有两种，圆的便宜，吃起来发酸，我买了一个长方形的。我边吃边在校园里转悠，发现考生的年龄跨度较大，有不少所谓的社会青年。还见到了一位瘸腿的姑娘，我给她拍照时，她面对镜头，双唇坚韧地微合，眼神友善略含平淡，至今我还能记起她当时的模样。我后来又连续拍了两年高考，上述的现象就看不到了。不少考生喜欢在自行车棚里复习，阴凉通风。北京七月的中午，蝉声此起彼伏，柳条儿